

【学术随笔】

中国文化中的“角色原理”刍议

王处辉

社会角色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社会学者一般都沿用西方社会学界对这一概念加以解释，说这个概念是指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和一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是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在人们用这个概念解释社会现象时所形成的理论，即可称为“角色理论”。所以，几乎所有的社会学概论性质的书中，都要论及社会角色，介绍角色理论。在当今我国的诸多社会学著作中，介绍社会角色或角色理论时，又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演员在戏剧中扮演某个角色作为例子，甚至一些著作还用“布景”、“道具”、“衣着”、“仪表”、“前台”、“后台”等戏剧术语作为社会学术语来解释“社会角色的表现”问题。大家都不假思索地认同了一个命题：人们的社会角色与戏剧演员的舞台角色的原理相同，只是“舞台”的大小有别而已。简而言之，即人们都接受了“人生如戏”的观念，好象从来也没有人问过：这是否完全符合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的社会角色概念与西方人有无区别？便匆匆地以这解释中国社会，乃至以之解释中国传统伦理及传统社会现象了。最近出版的由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中国传统道德讲义》，在论述“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体系和建构原理”时，便使用了“角色原理”一词。但在以之具体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行为准则时，并没能发掘出中国文化中“角色原理”的特色。本文就此问题谈一些看法，就教于时哲。

台湾散文家林今开写过一篇名为《如戏人生》的文章，说一位台湾老人途径日本，要在过境签证的两天时间内，去初步了解一下日本社会。他精心选择了三个切入点，其中之一是参观戏剧演出的后台。当他看完悲剧《茶花女》，经人介绍来到后台，看到女主角正由一位老妇人扶着走下台来，那位女主角仍在不停地唏嘘、呜咽着，表情非常悲怆，似乎戏还在上演，那位老妇人一边为她拭泪，一边安慰道：“姑娘啊！别再伤心了，...戏已经落幕了，我们不在巴黎，我们在东京：你不是苦命的茶花女，而是日本最幸运的姑娘。你慢慢回过来吧！乖，好姑娘，回过来吧！...”那老人见此情境后，感慨万千地说：“这一幕使我大开眼界，我活在中国社会，惯看‘人生如戏’，而今得见‘戏如人生’！”

人们所说的“人生如戏”，主要意思是说人在社会中生活，许多情况下都犹如演戏时扮演的“本我”之外的某个角色，只是按社会对那一角色的要求去言行，而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表演”结束后，再还自己的本来面目，如果这个社会大舞台需要他一场接一场地“演出”，那么他就必须不断地扮演某个“本我”之外的角色。可以说，这是社会学中的一种角色原理。那位老人在后台看到的扮演茶花女的那位演员的情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入戏了”或“进入角色”了。那位出色的女主角，已经把自己全身心地融入了角色之中，她的本我已和茶花女合为一体。不知道在她扮演的茶花女之外还有个“本我”的存在，这是一种高质量的“入戏”或“进入角色”。这就是那位台湾老人所感悟到的“戏如人生”的境界。

如果我们把舞台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的话，那么，所谓“戏如人生”就是社会学家达伦



多夫所说的“社会人”了。而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以塑造社会人为主要特色的。费孝通先生称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张东荪和梁漱溟在总结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特点时都认为，在中国的社会组织中，没有“个人”的观念，所有的人，不是父，就是子，不是君，就是臣，不是夫，就是妇，不是兄，就是弟，……。中国的“五伦”就是中国的社会组织，离开五伦，别无组织，中国社会“把个人编入这样层系组织中，使其居于一定之地位，而课以那个地位所应尽底责任”（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首先是角色的扮演者，不管是哪一位“演员”，只要他扮演某一个角色，他就要符合那个角色的行为和仪态。就如同演戏一样，比如各个剧种，或同一剧种中，演包公的名演员都可列举出许多，但无论谁演这一角色，只有演得“象”包公，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演员可以更新换代，但舞台上包公的形象却没有多大变化。名演员都是因为这个角色“演得好”，“演得象”才成名的。中国传统社会也是一样。比如“清官”、“孝子”、“贤妻”、“良母”，历代都有。人们可能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但每提到这些名词时，人们心目中自觉不自觉地就会浮现出作为“清官”，作为“孝子”等所应有的角色形象或行为方式。谁的行为符合了人们心目中的“清官”或“孝子”的角色形象，谁就会被人们称为“清官”或“孝子”，谁的行为丰富了“清官”或“孝子”的角色形象或行为方式的内容，那他他就是“大清官”、“大孝子”了，不管他是姓张还是姓李，也不管他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所以说，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角色，轻个人，或者说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个人依附于角色而存在的。这种传统历经数千年，至今仍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之中。

社会角色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在某种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某一角色存在的价值。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如此重视社会关系的原因所在。正如一位学者所概括的那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被蒸发掉了”（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1983 香港一山书店，11 页）。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认为离开了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个人的存在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社会传统具有“社会本位”或“集体主义”的特色，这是和西方文化中塑造出来的“个人本位”、以及要求人们“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做出内省式的再考虑”的“存在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参同上书）。

中国人因为重角色，重社会关系，所以注重把每个人都融于既定的社会关系及社会角色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人的社会角色化过程。中国人讲“修、齐、治、平”，之所以总是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原因就在于此。而中国历代所有的修身理论，核心不外乎三条：其一是告诉人们，为什么这一套角色系统（即社会关系系统）是合理的，甚至是天然合理的；其二是告诉人们怎样才算是达到了合乎这一套角色系统所要求的角色规范；其三是要求人们全身心地融入其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之中，达到不知社会角色之外还会另有“本我”的境界。从孔、孟、荀况到二程、朱熹，莫不如此。孔子讲“仁”、倡“礼”，教人们“克己复礼”，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孟子讲通过社会教化发扬人们生之俱来的仁义礼智四个“善端”；荀子讲“修身”，写“劝学篇”；二程、朱熹论“天理”教人正心诚意格物至知，都是围绕上述核心目的而展开的。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社会既定的社会角色系统（即社会关系）是合理的，只有使每个人都按既定的社会角色规范办事，就能保持社会的良性运作，这样的社会才能和谐稳定，才是理想的社会。这是中国人的价值系统的表现之一，也是中国历代以儒家为代表的社会思想家所极



力倡导的内容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角色，重社会关系，并不是要把每个人都变成木偶和机器，而是要每个人都体悟到自己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意义，并诚心诚意地，全身心地按这个社会角色规范的要求去办任何事情，以求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正如本文开头所举的那位演茶花女的女主角一样，把自己完全融入角色之中去，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一个人能在社会规范之中“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这种境界要求人们在社会角色规范中去表现自我的存在价值，而不是要求人们在既定社会角色规范之外，去创造一个新角色，以体现自身的存在价值。所以，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角色理论中也有“自我实现”的意识，那么，中国人的自我实现是与西方人所讲的自我实现具有显著区别的。西方人的自我实现，主要强调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的潜在能力，为此，人们可以去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工作和行为方式，以求完成一个最能表现自我潜能的社会角色；中国人则是在社会既定的社会角色体系中，为最大限度地扮演好某个角色去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以求丰富这个既定角色形象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人的自我实现，颇似“即兴表演”中的某个角色扮演者，其即兴表演得到普遍喝彩时，即是“自我实现”了；而中国人的自我实现则更像京剧中的角色扮演者，社会已经有了某一角色的既定角色规范和角色形象，要求演员不但演得像，而且要充分发挥自己得表演才能，使这个角色更符合人们心目中的角色形象。从而实现演员对这一角色形象的发展，这也就是演员的事业发展和成就所在了。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可见，中国人所说的“人生如戏”，其实更符合西方人的文化及社会角色观念。而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角色观念，则更符合“戏如人生”的概括。只是很多中国人在总结自己的传统文化及中国社会角色理论的特色时，尚未深入到这个层面。倒是本文开篇时所说的散文家笔下的那位台湾老人，活了大半辈子，才开始触及这个层面。可惜浅尝又止。更为可惜的，是最近出版的由罗国杰先生任顾问，由瞿振元等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1-55 页）一书，在论述中国传统的“角色原理”时，也还是停留在“人生如演戏”（同上书第 51 页）的深度，仍未能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角色原理”的“戏如人生”的特色来。

以上所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角色观，只是中西文化和价值观显著不同的一个例证。类似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还很多，都有待我们去研究去解说。只有我们理解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深刻差异，才能真正意识到中西价值体系的不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注意到不加分析即套用西方概念的不严肃性；只有这样，才便于我们更自觉地探讨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特点，而不至陷入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潭；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价值观多元化的趋势之中，在某些人欲将中国“西化”的嘈杂声中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我们总是说，我们从来不想把中国人的文化和价值观强加给别人，也不接受别人把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强加给我们。这无疑是正确的。而要将这一点真正落在实处，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总结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特色，不管其一时的总结概括准确与否和深度如何，只要人们有了这种意识，就是十分可贵的。这就是本文秉笔立意之所在。

作者：王处辉，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